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四三四）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〇一期 ——  
(二〇〇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709f)

【研究报告】从受难者看反右和文革的关联：以北京大学为例	王友琴
【史海钩沉】“文革”中造反派与右派的真实关系	周伦佐
【往事如烟】吴宓“偷书”	何 蜀
【动态报道】文革研究需要“搜索引擎”	何琥皓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

【研究报告】

从受难者看反右和文革的关联：以北京大学为例

• 王友琴 •

I. 题目和方法

从“反右”到“文革”，从1957到1966，相隔九年。二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呢？本文从受难者这个方面来进行观察和分析。（以下“反右”和“文革”这两个词都将不再带引号。）

从北京大学发生的事实可以看出：一方面，在反右中被划成“右派分子”的人作为一个群体，在文革中受到更为深重的迫害，被“斗争”和监禁，受到肉体和心理的戕害，有一批人被害死。另一方面，在反右中担任领导和积极分子角色的学校负责干部作为群体，在文革中也沦入被“斗争”的地位上，其中有一批人也被迫害致死。

受难者的遭遇指示出一条明晰的轨迹：相隔九年的这两场大规模“政治运动”（这是反右和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使用的称谓），总的来说就是群体性迫害及其发展。这种发展，具体表现在一方面是迫害手段的更加野蛮，特别是所谓“群众专政”方法的普遍采用和校园暴力的大规模发展；另一方面是迫害的对象进一步扩大，不但在人数上增加，而且被迫害的群体种类也越

来越多。

从受难者的角度切入反右和文革历史，不但出于对人的生命和权利的尊重的基本价值，也因为只有了解受难者才能认识这两个大事件，因为对人施行迫害是反右和文革过程的主要组成部分。

本文所用的材料，来自我在过去十多年中对文献资料的广泛搜集和仔细阅读，也来自我对大量经历者的调查采访。关于这两种资料来源，余英时先生曾在给我的《文革后难者》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指出，孔子将其分别称之为“文”和“献”（“文献”是后来才变成一个词的）。在方法上，本文依然是对“文”与“献”的探索的结合。由于大量受难者的资料从来没有被记载或报道，两种材料来源中，调查寻访尤其重要。

对于接受笔者采访的人，笔者深怀谢意。感谢他们为记录历史真相提供帮助。

## II. “右派分子”在文革中受到更深迫害

据《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

1958年1月31日的记载，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和延续到1958年1月底的三个月的“反右补课”中，北京大学有589名学生和110名教职员，一共699人，被划成了“右派份子”。

在同书的1982年部分（那时“右派分子”回到学校办理“改正”即撤销原处分）说，北京大学反右派时划了716个右派份子（890页）。两个数字不同，是因为后来又“补划”了17人。因前一次的数字分别说明了学生和教职员中的“右派分子”人数，所以引用在这里。另外，据文革结束后的《人民日报》：北大划了715名“右派分子”，还有未戴“右派帽子”受了各种处分的人842名。因为没有公布所有被“划”的人的名单，现在不清楚715和716之差别是如何产生的。

当时北京大学全校学生人数是8983人，教职员人数是1399人。北大总人数的7%被划成了“右派分子”。教职员中的“右派分子”比例高于学生，接近10%。教授中的比例则更高。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讲话说：“右派只有极少数，像刚才讲的北京大学，只有百分之一、二、三。这是讲学生。讲到教授、副教授，那就不同一些，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在文革后，这个讲话印刷发表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题为《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比较毛泽东的讲话和在北大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大规模的“划右派”的行动，是在毛泽东的具体指示下执行的。非常恐怖的是，他制订百分比划取右派分子。也就是说，不管如何，一定要从人口中抓出某个预先确定的数额的人来作为“阶级敌人”打击。而且，这百分比是他一个人相当随意地决定的。

“反右派运动”在极大地改变了社会惩戒机制。首先，是权力当局以发表言论为犯罪，把一大批人“戴上帽子”并进行各种惩罚，尽管这些人并没有违反法律也没有危害他人。第二，本来学校能作的最高的处罚不过是开除学生学籍或者解雇教职员。学校的学生教员若有刑事犯罪，只有司法系统可以审判。学校当局把七百多名教师学生划为“阶级敌人”，这是人类学校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权力。第三，不但实行惩罚，而且惩罚不设定限量。一批学生被学校直接送去“劳动教养”而不设结束的期限，以至他们失去人身自由达近二十年。甚至“摘帽右派”也

仍然是一个坏身份。

文革中，北大的新权力当局“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具有了比原来的中共北大党委更进一步的权力，他们在校园里就建立了庞大的“劳改队”，强迫所谓“牛鬼蛇神”在学校里“劳改”，而且把他们剃了头发，对其中的女性则剃去半边头发，有专用名词称为“阴阳头”，命令他们在胸前悬挂写有罪名和他们自己的画上红叉子的牌子。后来，又在校园里建立了关有数百人的监狱，也就是被俗称为“牛棚”的地方，因为那里被关的人被称之为“牛鬼蛇神”。在“牛棚”中，被关押者失去人身自由，而且常遭到殴打和侮辱，以及心理上的虐待。在北大文革造成的63名受难者中，有四人是被红卫兵学生用棍棒和铜头皮带活活打死的，连“揭发”“批斗”“定性”这些“革命程序”都不曾有过，残忍野蛮，达到了新的高峰。

“右派分子”在文革前已经遭迫害九年，再加上文革十年，文革结束后又过了两年才得到“摘帽”和“改正”，全程长达21年。在笔者的采访中，有一名受访者，自己并非“右派分子”但同情“右派分子”，使用了一个说法，叫做“右派表情”，意思是当过“右派分子”的人脸上有一种特别的表情，是长期受到迫害和压抑后形成的，明显到使人能觉察得到，连摘掉帽子或者“改正”以后都依然还在。

这种“右派面孔”表情，是长达21年的身心遭到迫害后形成的。这种表情可能因人们对苦难的司空见惯态度而被忽略，而大量的迫害事实也一直被排除在官方准许的发表物之外。下文是对他们在文革中的遭遇进行具体的描述。

## 1、被判死刑

在北大的716名“右派分子”中，就笔者了解到的，有五名在文革中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在反右时就有一名“右派分子”黄宗奇（哲学系学生）因与看押他的北大学生发生身体冲突而被判处了死刑（因事实上并无伤害人身事发生文革后平反了）。一共有六名“右派分子”被判处死刑，占全部716人的近百分之一。也就是说，几乎每一百人中有一人。这个死刑人数，不但对北大“右派分子”群体是非常高的比例，对北京大学一个学校来说也是非常高的比例。

五名在文革中被判处死刑的人是：中文系学生林昭（1954年入学），1968年被处死；数学力学系教师任大熊（1955年在北大毕业留校任助教），1970年被处死；西语系学生顾文选（1956年入学），1970年被处死；历史系学生沈元（1955年入学），1970年被处死；化学系学生张锡锟（1954年入校），1976年被处死。其中林昭为女性。五人中三人在1970年被处死，是在文革的“打击反革命”运动高潮中。

林昭在上海被判处死刑，时间是1968年4月29日。那是“五一节”前，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对一批“反革命分子”“宣判死刑立即执行”（见《解放日报》报道语。）。这是文革的庆祝节日的方式。

顾文选和沈元都在北京被判处死刑。1970年2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一份材料，把“顾文选等55名罪犯的材料发给各单位”，要“革命群众”“提出处理意见”。沈元也在这份材料中。（可见于笔者收集的这一材料照片。）55人中北大“右派分子”占了二人。这种做法的功能之一是在普通老百姓中制造更大恐怖，如古语所说的杀一儆百。这份材料发出仅仅两个星期后，1970年3月5日，他们被处死。

任大熊1970年3月28日在山西省大同市被判处死刑。1957年他把北大图书馆英

文《工人日报》上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大清洗”杀害无数俄国人的报告，翻译了一些段落手抄后贴在学校阅报栏上供观看。他被划成“右派分子”后又被判刑，在文革中再被判处死刑。从笔者收集到的判决书上可以看到（见照片），判处任大熊等13人死刑，没有援引法律依据，只写着：

为了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妻子批示“照办”的“一三一”指示，坚决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加强战备，保卫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党的政策和广大革命群众要求，报请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准，特依法判决如下：

所谓“一三一”指示，指毛泽东批准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中发〔1970〕3号文件。毛泽东在此文件上批的“照办”二字就是判处死刑的依据。这是人类法制史上前所未有的死刑判决书格式。同时，判决者判处他们死刑，甚至未声称他们有何反抗革命的行动。仅仅因为他们的“右派”言论或者思想，就可以把他们判处死刑。

由于未能对全部716名“右派分子”的下落作追踪调查，笔者对他们中在反右后离开北大的人的文革遭遇缺乏全面了解，特别抱憾的是至今仍不了解他们中有多少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下文记述的是留在北大校中的“右派分子”的遭遇。

## 2、在北大被迫害致死

笔者写有《63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63人是北大总人数的百分之零点五，即每二百人中害死一人。63名受难者中有四人，英语教授吴兴华、历史教授向达、中国革命史教师许世华和图书馆学教授王重民，都曾在反右中被划为“右派分子”，遭到降薪降职处分。

吴兴华和向达都在文革一开始就被“揪出来”进了“牛棚”和“劳改队”。1966年8月3日，吴兴华在北大西门内办公楼前“劳改”时，被强迫喝了水沟中从附近化工厂流出的污水中毒昏倒。红卫兵斥责其为“装死”。当天夜间吴兴华死亡，时年43岁。死后还被剖尸，不是为了医学目的，是红卫兵要证明他“对抗文革自杀”以罪加一等。

向达在1966年8月遭到残酷“斗争”，曾在毒日头下跪在系办公室二楼阳台栏杆外狭窄的平台上被斗，幸好没有从上面摔下来。9月底他和历史系其他“牛鬼蛇神”被押到昌平区太平庄劳动，晚上他们的寝室的门被反锁，连夜间出门上厕所都不准。向达有肾病，排不出尿，全身浮肿，却不准送医院救治。他在11月10日去世。

他们是名教授，反右时受到的惩罚是吴兴华从三级教授降为五级，向达从一级教授降为二级。他们在文革前夕的处境，比起其他“右派分子”来算是有很大特权的，但文革一开始，他们首当其冲，被革命的铁轮无情地碾碎了。

许世华在北大附近的西苑投水自杀，王重民在颐和园后山上吊自杀。他们的死其实不能被理解为通常意义上的“自杀”。他们是在遭到长期的迫害、遭受了肉体和精神的重创之后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上文写到的顾文选，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主要原因是1957年5月25日在北大办公楼礼堂讲述了他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被冤枉监禁的遭遇。那天还有西语系学生周铎讲了他看到的公安局刑讯逼供的事情。结果二人都成为“右派分子”。周铎1957年被送去农村劳动，1961年才被准许回校上课，1962年毕业后在北大工厂劳动。文革开始后周铎一直在学校的“牛鬼蛇神劳改队”里，袖子上戴了一个黑袖套，上面写有白字“右派周铎”。1

1968年，周铎被关进了北大“监改大院”，最大的校园“牛棚”，位于现在的塞克勒考古博物馆的位置上。

同关“牛棚”的一位教授说，周铎挨打最多，裤子上总是沾满鲜血。红卫兵看守经常用竹片子打他，竹片子打人最疼。他们还常拿周铎寻开心，没事就大叫“周铎，过来。”然后用棍子打他的脚。他们打一棍，周铎的脚缩一下，他们又打一下，周又缩一下。

有一次骡车拉东西来。饮骡子的时候，红卫兵命令周铎和一个法律系的教授像骡子一样套上车拉着在院子里来回跑，他们看得哈哈大笑。周铎看起来像鲁迅写的“狂人”，样子可怜极了。

周铎后来转入西语系的“牛棚”。

一个管牛棚的红卫兵学生每天踢开门进来（从不用手推门），全体“牛鬼蛇神”起立，这个人每次进门以后，首先就转向周铎，甩开膀子狠打周铎几个耳光。周铎在1969年被放出了“牛棚”，和他同住在那一间“牛棚”西语系教授说，听说他不久后就死了，但是不知道确切地点和时间。

### 3、被判刑

北大数学力学系王信中、程庆明、刘品馨是1949年入学的同班同学，毕业后都留校任教。

1957年中共北大党委号召群众“帮助党整风”，王信中写大字报批评当时人整人的风气。他因此被定为“极右派”，送劳改农场。

程庆明当时是该系的中共总支委员和共青团书记，在划定“右派分子”的会议上不同意把两个学生划上，被指控为“包庇右派分子”，以此为由把他“补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共产党籍，降职降级降薪。

文革中程庆明因和朋友私下议论文革被指控为“现行反革命”。他曾经被绑在学生宿舍的一个双层床上，双脚离地，遭到毒打。1969年，他被作为“拒不坦白”“抗拒从严”的典型，在北大办公楼礼堂的“斗争会”上被逮捕入狱，一年多后判刑12年，送到山西监狱服刑。毛泽东死亡两年后，1978年底他在刑期快满时被释放。

刘品馨（1931—1996）对两名同班同学被划为“右派分子”心存疑问，她没有敢公开说出自己的想法，但是写在了日记中。文革中日记就可以成为定罪的根据（在这方面，请参看我的《摧毁日记的革命》）。刘品馨遭到长期“斗争”，不但在打人斗人的高潮1966—1969年被“斗争”，而且在1973年“反回潮”中还被揪上台“斗争”。她曾经被揪住头发打耳光（这样的暴行当时可以在北大当众发生不被制止）。遭到这样的残酷折磨后，刘品馨精神失常。1978年底程庆明出狱后去看望，她已经丧失记忆不认识程了。她从未恢复健康，在65岁时去世。

仅仅由于在日记上对“右派分子”表示同情，文革让刘品馨付出了致命的代价。在北大，很多根本不认识她的人都听说了数学系的一名女教师因日记获罪。刘品馨的悲惨遭遇成为强有力的警告，文革中几乎所有的北大人停止了写日记，而文革前在北大写日记的人相当多。

### 4、“中右”也变成“牛鬼蛇神”

除了被划为“右派分子”，1957年北京大学还有未戴“帽子”而受各种处分的人842人。在文革中，这些人很多“升级”成为“牛鬼蛇神”遭到“斗争”和“专政”。

化学系教授傅鹰（1902—1979），1952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曾在全校的会上作为正面典型发言，1957年被划为“中右”（即比他右的人就是“右派分子”），文革中成为“牛鬼蛇神”。显然，划分“阶级敌人”的标杆在不断左移，越来越多的人被圈进去了。傅鹰遭到长期监禁和“斗争”。他先被关在化学系男生宿舍。白天由该系女生看管在校园里“劳改”，晚上由该系男生看管。连他因年老夜间多次上厕所也遭学生斥骂。后来他被关入学校“监改大院”里。那里一个当看守的女学生有个棒子。“监改大院”每天“晚点名”以后，这个女学生就在院子中间用她的棒子打东方语言系的副主任岑殿华，逼其承认曾经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岑殿华不承认。傅鹰看到这个情景说，按照划定“历史反革命”的“标准”，即使参加过“三青团”也只是“一般历史问题”，现在她天天被打也不承认，大概不会是。傅鹰教授的逻辑推理很是清晰。但他说的这些话被报告上去，结果为此他也挨打。

傅鹰侥幸活过了文革，但是文革中北大的教授被害死的有百分之十。

## 5、高比例死亡率

尽管还未能了解所有七百多名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在文革中的下落，但是可以肯定，他们在文革中被折磨死亡的比例非常高。

1952年燕京大学外文系有五名英文教授，除巫宁坤外，另外四名在“院系调整”中并入北大。其中两名男教授胡稼胎和吴兴华，都在北大被划为“右派分子”。两名女教授俞大因和赵萝蕤，自己没有划成“右派分子”，但是她们的丈夫，俞大因的丈夫曾昭抡及赵萝蕤的丈夫陈梦家，都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巫宁坤那时在北京外交学院任教，也被划为“右派分子”并被送去“劳改农场”，受迫害最重。

如果说在1957这个燕京大学英文教授群体是“一网划尽”，那么文革就真成了俗语所说的“一网打尽”。上文已经写到其中之一吴兴华教授在1966年8月3号被强迫喝脏水而死。三个星期后，1966年8月25日，西语系红卫兵在40楼前召开“斗争会”，俞大因教授被强迫跪在台上挨斗并被抄家。她当晚在燕东园家中服毒自杀。她的丈夫曾昭抡（1957后被派往武汉工作）在武汉大学遭到长期“斗争”，在1967年12月9日死亡。赵萝蕤教授的丈夫、考古学家陈梦家在遭到毒打和侮辱后，1966年9月3日上吊自杀身亡。赵萝蕤被“斗争”，还遭到殴打，连文革前不久毕业留校的女助教都动手打她。她一度精神失常，后需长期服药控制。

胡稼胎的二儿子胡功管（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编导）和三儿子胡功范（四川峨嵋银行职员）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二儿子并被送到北大荒劳动。

他自己成为“右派分子”后从二级教授降为六级，不准上课，先在校园作体力劳动，后到北大哲学系翻译资料。1966年文革开始后，他被“抄家”、“游街”和“斗争”。因为他早已是“右派分子”，而不是新的革命对象，所以“斗争会”上他总是“陪斗”（当时“斗争会”频繁，所以专门术语也发展繁多）。1966年10月他突然瘫痪。妻子把他送去北医三院。医院索要北大的公函才予治病。哲学系给医院的公函上写的是：该人是我系右派分子，请给予一般治疗。他没有能得到什么治疗就出了医院，1968年1月去世。

就这样，燕京大学留在北大的四名英语教授，文革中被迫害死亡三人，唯一幸存者的丈夫也被迫害致死。

### III. 反右领导干部在文革中被“斗争”而死

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文革中不但“右派分子”首当其冲惨遭迫害，在北大领导了反右的负责干部也遭迫害，有的被害死。

1957年领导北大反右的，先是中共北大党委第一书记和副校长江隆基（1905—1966）。他在1959年被调往兰州大学任校长和中共党委书记，文革中成为最早的受难者之一。中共甘肃省委在发动文革的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知》发出后，把江隆基作为该省的重点对象。6月17日，他遭到“斗争”，跪在高台桌子上，头上戴了重十多斤的铁笼子。6月22日，他再次被“斗争”时下跪、戴高帽子、被拳打脚踢和“游街”。6月25日，中共甘肃省委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他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当天下午江隆基自杀身亡，时年61岁。

江隆基1927年就参加了共产党，对“革命”和“斗争”经验丰富。他在1956年被定为“高校行政一级”，是当时中国高校中级别最高的人之一。他显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但是他被“斗争”后，没有申诉也没有等待，很快就自杀，显然他理解革命的本性更为透彻。他是一个被“打倒”的群体中的一个，就像“土地改革”中的地主一样，没有为自己辩护的可能性，如果不想继续被打被侮辱，只有自杀。学校领导人是文革中受迫害最深的群体之一，无一例外被“斗争”。他们遭到学生红卫兵的殴打折磨，有一批校长被活活打死。（请参看笔者《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

江隆基被认为在北大反右不力，国务院于1957年10月派陆平（1914—2002）到北大取代江隆基当第一书记。陆平在江隆基已经划了五百名“右派分子”的基础上，进行“反右补课”增划了二百名。（“补课”本是一个学校的专门用语，却被用到了反右大迫害上。人类的学校史上，哪里有过这样大规模的迫害课程？）这样，北大的“右派分子”就从北大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增加到了百分之七。此后到文革前，陆平一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共党委第一书记两个职务。（江隆基只任副校长。）大学校长从教员中产生的传统也就此被彻底打破。文革开始，毛泽东亲自下令向全国广播北大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什么？”的大字报，并把北大称为“反动堡垒”。陆平成为全国闻名的“黑帮”，遭到长期的“斗争”和关押。他曾经被吊起来拷打。北大学生还用高瓦数电灯强光照射他的眼睛不准其睡着，说这样可以扰乱他的神经，迫使他“坦白交代”。

中共北大党委副书记、教务长崔雄昆，也是“反右派”的领导人之一。文革开始后，由于他曾经在1964年反对陆平，他成为“左派”并进入新的北大权力机构核心，而没有像其他北大领导干部那样被指控为“黑帮分子”。但是他最终也没有逃脱被整肃。在“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和“党的核心小组”中担任领导人两年多后他也被整肃，结果，1968年10月他在校内红湖投水自杀。

由于文革把整个教育系统指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结果，那些在1957年领导了“反右斗争”并在此后执掌北大的干部，除了极个别人，都被“打倒”了，有的也被迫害致死，他们的遭遇就像九年前由他们经手“划”的“右派分子”。

他们当然不是受到了“右派分子”的报复，因为文革中“右派分子”处于比他们更恶劣的处境中。也不能说他们是受到了“恶有恶报”的“报应”，因为还有大量和他们一样在领导反右

的人没有受到丝毫损害。他们被迫害，就是因为毛泽东发动和规划了文革，把他们这一个群体列为文革的打击对象。

他们先扬后抑的经历，甚至形成了一种有强烈反讽意味的戏剧性效果，不过并非出现在舞台上。遗憾的是，他们中几乎没有人分析他们的遭遇并得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甚至包括他们中最有学识和写作能力的人。

翦伯赞（1898—1968）是这样的人之一。他在1937年加入共产党，历史学教授，1952年起任北大历史系主任。1957年反右时他相当积极。笔者检索《人民日报》发现，在反右高潮中，从1957年6月15日到10月19日，四个月中该报有九篇报道，述及翦伯赞在历史学界、社会科学界、文物界的一系列反右会议上用严厉口气“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该报上还有他写的两篇反右文章，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历史是为了革命》（1957年9月23日），另一篇是《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1957年10月4日）。两篇文章攻击历史学界的两位重要教授雷海宗和向达。二人后来都被划为“右派分子”。雷海宗1962年去世，时年55岁。向达在文革中被迫害死亡，可见上文。

1965和1966年，毛泽东在高层会议上多次点了翦伯赞的名字，把他作为学术界文革的重点对象。指控翦伯赞“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篇文章题为《为革命研究历史》，竟与上述他1957年指控右派的文章标题同出一辙。罪名很快升级，1966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长文题为《反共知识分子翦伯赞的真面目》。从1966年6月开始，他在各种规模的“斗争会”上被“斗争”，最多时多达一天被“斗争”六场，“斗争”方式是拳打脚踢、坐“喷气式”即身体被强制成双臂后举大弯腰。他被“游街”、抄家及驱逐出原住房。分给他和妻子的一间小黑屋（在蒋家胡同三号院內），是在两排房子接缝处加出的，原来用于堆放煤块等，面积极小，到处漏风。他们在门口放一煤炉做饭熬药，附近的孩子常来往他们的锅里吐吐沫和丢脏东西。

1968年11月，在正式宣布刘少奇的罪名并将其开除出党的中共中央全会上，毛泽东说，要把翦伯赞等作为“反面教员”“养”起来。他被从“牛棚”中释放，被分配到条件较好的住房。一个月后翦伯赞和妻子戴淑婉一起服安眠药自杀。翦伯赞夫妇死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高潮时期。这个“清理阶级队伍”在全国造成的死亡人数，据计算比官方公布的反右划取了“右派分子”55万人还多。

应该说，翦伯赞的死实际上包含有抗议的意味。但是在他简短的遗书中，他没有抗议他所受的迫害，相反，他写的是“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对他自己在文革中所遭受的迫害（他死时文革已经开始两年），对1957年被他指控为“右派分子”的向达之死（他死时向达已经被害死两年多），对他当了积极分子的反右和当了打击对象的文化大革命，对于发生在他周围的迫害和死亡，他作为历史学教授却没有写下片言只语。是他不敢写，还是他不曾思考？或者，是因为在他看来太难说清楚？

也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活过了文革的和翦伯赞身份地位相仿的人，也没有能提供他们的内心经历和对这一段历史作出必要的解释。他们对历史的记载、解释和评判的缺乏，只能使他们的后人意识到反右和文革的强大效果：不但摧残了一批人的生命，而且摧毁了他们原本应产生的思想。他们没有写出什么这个事实本身也令人震动和悲哀。

#### IV. 分析和解释

##### 1、北大案例的高度代表性。



北京大学反右划了716名右派分子，北大文革造成了63人死亡。其他高校也相仿。清华大学反右划了571名“右派分子”，清华文革造成了58人死亡。清华58名文革受难者中，至少有二人是“右派分子”。北京农业大学反右划了143名右派分子，全校有13.4%的教授、副教授，4.7%的大学生被划成“右派分子”。文革中北农大有30人被害死。

各大学受迫害人数呈现明显的均匀现象，显然是因为反右和文革都是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而北大因其“最高学府”的特别地位，在反右和文革中都充当了双重角色：一方面是打击对象，有大批师生员工遭到残酷迫害，另一方面又是迫害样板，中共中央多次发出内部文件或者通过公开报刊，把北大的做法介绍给全国效仿。这种情况使得北大作为一个案例极具代表性，因而也更值得分析和解释。

## 2、反右和文革是大规模群体性迫害

在以上描述中可以看到，反右和文革，都造成了一个数字巨大的受难者群体。也就是说，二者都是大规模的群体性的迫害。在笔者看来，这是二者主要的也是共同的特性。

反右和文革都不是针对个别人的。“右派分子”后来和别的“敌人”范畴并列为“地富反坏右”，又称“五类分子”。这是一个“类”，而不是个别人。这个“类”人数众多，可以百万计数，到了文革，在已有的“五类分子”之外，又加出了多个种类。例如，1969年的北大一份题为《关于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情况报告》说，该年7月上旬到9月2日，在北大的教职员中，清理出了“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和“地富坏分子”共102人。这份报告由毛泽东批示“照办”后发给全国学习，编号为“中发〔1970〕17号”。也就是说，在全国各地都要抓出这些“类”的“阶级敌人”来。在北大，三个月“清理”出的“阶级敌人”数字占教职员工的百分之二还多，在全国显然会制造出一个极大的绝对数字。

除了立“类”之外，还制定百分比，以确保每一类都能填够配额。北大的“反右”，先是按照百分之五的比例划的。“上面”嫌百分之五不够，北大就进行“补课”，增加到了百分之七。

在苏联档案中存有一些关于杀人和关人的命令。1937年7月30日的一份，列出各个加盟共和国要杀的人数从100到2,000，同时还另外列出了数倍于此的要逮捕入狱的人数。

这样的命令非常恐怖：不但在于数字大，还在于其随意选定“敌人”的数字。同样，毛泽东以百分比来划“右派分子”，也是同样恐怖。

## 3、文革是反右迫害的升级与扩大

上文已经描述，1957年反右的受害者，在文革的火坑中被推到更深处，在1957年还未成被“戴帽子”的人，文革也被关进了“牛棚”，甚至连反右的积极分子也被置于死地而丧生。一方面，反右和文革都是大规模的群体性迫害，另一方面，后者比前者更为严重。

不仅事实表明如此，从两次“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的理论中上，也可以明显看出。1957年，他创立了所谓“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理论。他把公民分为两种，“人民”和“敌人”，至于谁是“敌人”一类，则是由他规定的，比如“右派分子”。按照当时的宪法，公民享有“言论自由”，但是毛泽东说他们是“敌我矛盾”，他们就成了“敌我矛盾”。文革中知识分子被指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是毛泽东一个人规定的。在文革中，毛泽东进而提出了

“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就是说，要把原来的革命更推进一层。在不断叠加的革命中，受难者越来越多越来越苦。

本文第三节叙述了反右积极分子在文革中遭到迫害甚至被迫害致死。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但是对此事实的解释，却并不一致。有的人以此证明文革的“荒唐”，非逻辑，打击了不该打击的人。这一说法似是而非，首先因为这多少等于肯定了反右。另外，看施害一方，他们的革命就是迫害，他们在逻辑上和行动上相当整合，在基本方面并不自相矛盾。

从理论到实践，文革领导人的改变意向是清楚的。江隆基和陆平这些领导了1957反右的人，即文革前的大学的领导人们，在文革中全数都被“打倒”。如笔者在《文革受难者》书中写到20名大学领导人之死时指出，这些人从未担任大学教员，由他们担任大学最高领导，已经改变了历来由教授学者中产生校长的传统。但是江隆基和陆平自己上过大学。文革开始，毛泽东就指控学校系统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接着他派送了他的警卫部队中的迟群、谢静宜等没有受完中学教育的人担任清华和北大的负责人，直到他死亡。在这种暴力迫害的同时，毛泽东一步一步改变了教育体制。

还有一种解释离开事实更远，即文革前受迫害的人在文革中“造反”，反对迫害过他们的人。实际上，文革领导人对镇压右派分子颁布了一系列明确规定的有一系列明令规定。从北大案例可以清楚看出，文革中“右派分子”是受苦最多的群体之一。至于反右积极分子被“斗争”，决非出自“右派分子”的报复，而是来自最高领导人的指挥。

#### 4、这是一种什么犯罪？

杀一个人，就是犯罪。杀害了数字如此巨大的人，侵犯了如此多的人的自由、人权，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残酷惩罚了那么多人，当然更是犯罪。

但是对于同一历史事实，记述和判断却有很大不同。在反右和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那一边，他们称之为“伟大的革命”。直至今今天，在反右和文革的同情者眼中，注意的是当时作为驱动力方面一方的“理想主义”和高昂欢乐的情绪，他们回避提及受害者一方的苦难，更不承认这是一桩罪恶。

在毛泽东死亡两年以后，邓小平和胡耀邦为反右和文革的受害者“平反”，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群体性“平反”，在人道方面的功劳应该被记入史册，当然也是因为发生过的迫害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他们为这个庞大的受害者群体的悲惨生存状况作出了一些实际性的改善。但是，在说法上，他们仅仅称此行动为“平反冤假错案”，似乎这些都是个别性的案例。这个说法显然不符合事实，而且他们自己也并不真如此认为，否则不会给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反右和文革的受害者一起都平了反，而不是只给其中的一部分人甄别。

对于反右和文革的反对者来说，有一个问题是，应该把它们称为什么样的罪恶？显然这是一种巨大的罪恶，然而既有的关于罪恶的名称，谋杀，盗窃，投毒，诽谤等等，却难以被用来指称这样的罪恶。反右和文革罪恶包含传统意义上的这些罪恶，但是这些名称只有很小程度上的适合，因为这些罪恶杀害和迫害的人数，都不可能与反右和文革相比。普通的罪犯，即使是惯犯或系列杀手，也不可能危及如此巨大数目的受害者。只有战争会危害如此多的人口，但是战争主要由军队持武器进行，而且战争是两军对垒的冲突，相当不同。

在现实中，没有名称的罪恶就可能不被认为是罪恶。反右和文革的罪行不但需要得到记录，而且需要命名。

在抵抗和清算希特勒纳粹的漫长过程中，一位名叫 Raphael Lemkin 的学者，用其毕生精力创造并推广了一个关于罪恶的新词 genocide。在 Lemkin 和其它人的长期努力之后，“群体灭绝罪”成为在国际上被接受的罪名。“群体灭绝罪”是指蓄意全部或者部分消灭某一群体，包括杀害该群体的成员，造成该群体成员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故意使该群体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下，毁灭其全部或部分的成员，强迫这一群体的儿童离开他们等等。这种群体，是基于政治、种族、民族、文化、宗教、等理由划分的。

希特勒杀害犹太人的行动，就属于典型的群体灭绝。在那里，被迫害、监禁、罚作苦役以至被杀害，最重要的“理由”（加上引号，因为这仅是作恶者一方如此认为的）是该人属于“犹太人”这个按照民族划分的群体。

这个模式是否适合反右和文革？在人数上，显然是的，在群体性方面，显然是的。不同的是用来划分这些群体的“理由”和名称。

## 5、历史的审判

在反右 50 年后和文革 40 年后，在书写和传播技术如此便利的电脑网络时代，已经有条件来做历史的审判，也就是通过历史写作来审判罪恶。

这种历史的审判是有意义的吗？

文革后期，按照毛泽东的旨意在北大校园建立了一个“梁效”写作班子，发表了大批文章，主要内容是批判孔子和鼓吹秦始皇。例如，其中一篇文章题为“略论秦始皇暴力”（《人民日报》1974 年 1 月 21 日），对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受到谴责的秦始皇大加赞美，并把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文革“镇压反革命”直接等同，也就是说，要从历史的高度来肯定和合理化文革的群体性迫害与杀戮。

现在回头看这个曾经不可一世影响很大的“梁效”，也让人思考另一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能和秦始皇一样大规模“焚书坑儒”的统治者，毕竟秦始皇以后的两千多年里也只出现过。是什么力量起了阻挡作用呢？应该说，在秦始皇后两千年来人们把“焚书坑儒”当作罪恶来记载和谴责，这些历史评判尽管以现代标准来说还不够深刻，却多多少少起了作用。

这个历史的纵向观察告诉我们，通过历史写作对罪恶做出审判，在文字上、学术上对历史事实进行描述和分析，虽然不能像在司法系统中审判罪恶一样有力，但是并不完全无用。所以，对反右和文革做出历史的审判，仍然是重要的和有意义的。

写于 2007 年 2—3 月，芝加哥

□ 原载《观察》网站

~~~~~  
【史海钩沉】

“文革”中造反派与右派的真实关系

• 周伦佐 •

两个尖锐的年头接踵而至：2006年——“文革”爆发四十周年，2007年——“反右”发生五十周年。两个运动相隔九年时间，都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发动和领导，暴露出的反人性、反现代性的险恶性质，如出一辙。然而，对于“文革”四十周年，人们只能用沉默来祭奠；对于“反右”五十周年，人们却以抗议无端迫害和要求彻底平反的方式进行了有声的纪念。其中差异，似乎来自“文革”的复杂性。例如人们常说：1966年10月—1968年8月的民众造反运动，不只冲击了中共的各级当权者，而且也迫害了包括“右派”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文革”中，造反派与“右派”的真实关系究竟怎样？

当我们要求中共为“右派”彻底平反之时，似有必要澄清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说实话，想到这个问题就令人心寒。不是没有真相可言，而是因为几十年来，人们基于附势心理的误记、误言和误断对事实真相的太多歪曲。

事实明摆着：1966年10月以前，造反派的前身——下层黑色和麻色青年人群，就因为与当年“右派”们同样的出身和言论而被打“小右派”，同“老右派”一起遭受各级当权派、工作组和官办红卫兵的迫害。这之后，他们起来造反的主要对象，又正是当年将55万知识分子直接打成“右派”并对其使尽专政手段的各级当权派。三年造反期间，由于大方向是斗“走资派”，加上同病相怜，他们对“右派”实为避而远之，从未像官办红卫兵那样残酷地进行迫害。

凡是自我稍为真实和良知尚未丧失的人，都应该从历史真实和心理真实的双重角度，承认或至少默认这一事实。

然而，在“右派”们的回忆文字中，至今为止，我只看见被视为政治异化的丁玲、刘绍棠和被誉为刚直不阿的刘宾雁、邵燕祥，摸着良心说了真话。此外，无论普通人还是文化名流，大多是所谓“遭受造反派迫害”的昧心之言。

我记得丁玲和刘绍棠二人从未自撰受造反派迫害的光荣事迹，反而在有关文字中坦言造反青年曾经关照过自己或保护过自己的文稿。

刘宾雁没有说自己与造反派的关系，而是谈自己对造反派的认知，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那篇引起巨大争议的报告文学作品《未完成的埋葬》里。他写的是上海海运学院的事。通过调查分析，他发现至少在该学院：“文革”中的造反派大多是“文革”初期及此前政治运动的挨整者，1966年秋至1968年夏造反并得势，1968年“工宣队”进校后重新失势并再度成为挨整对象，“文革”结束后继续挨整。与此相反，“文革”中的保守派，大多是“文革”初期及此前政治运动的整人者，1966年秋至1968年夏失势并受压，1968年“工宣队”进校后重新得势并再度整造反派，“文革”结束后继续整人。（1）

这篇报告文学后来受到批判和追究，因为它触及到了历史的真实。

邵燕祥1959年9月由中央广播事业局摘掉“右派”帽子。“文革”初期的1966年6—12月，被中央广播电视剧团官方“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并开除公职监督劳动。1967年2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中央广播事业局造反派“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下属组织——“广播电视剧团战斗队”，宣布官方“文革小组”对他的“戴帽”处理无效。剧团群众组织分为两派，保守派反对为他“平反”，造反派坚持为他“平反”。邵燕祥坦言“我在感情上是倾向后者的”。1967年2月起，为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和政治权

利，他也起来造反了——写大字报批判迫害自己的剧团当权派。（2）

凭我所了解“右派”们的敏感、善良和正直，我不相信他们宁肯与历来整人的当权者尽弃前嫌，也不愿对后来挨整的造反者表示同情。须知，这些当权者也曾整过他们，这些造反者也曾同他们一起挨整。“文革”前期的造反者曾因政治机遇而风光一时，但他们造反的对象主要是过去同样整过“右派”的人。我不相信“右派”们不曾暗自高兴，我不相信“右派”们不曾产生内心的共鸣，我不相信“右派”们不曾为他们的最终结局隐隐担心。因为这有违心理的真实，我不相信。除非这些知识分子作为人应有的七情六欲已经被政治说教式的虚假观念彻底代替。

我相信狱中的胡风拒绝过对周扬这位曾经置自己于死地的文化官僚落井下石。但是，除了有污人品的卑劣之举，我不相信他从未有过一丝暗自的快慰，除非他已处于精神分裂的边缘。

我更相信胡风的弟子——在“整风”、“反胡风”和“反右”三个运动中连续挨整的军旅诗人胡征，在“文革”中对整人者采取造反之举的合情合理。因为这更符合人性的真实和心理的逻辑。

遗憾的是，偏偏有人为了成全自己观念的崇高，不惜牺牲别人心理的真实。

新进学人李辉在其《风雨中的雕像》一书中，有一段描写萧乾1966年6月间有关心态的文字：

6月，他和首都许多文化界人士一起，都集中到社会主义学院，几百名昔日名人，在高高的院墙里，度着还算正常平静的日日夜夜。那时的萧乾，心里获得了1957年以来的第一次满足。这个“右派”分子，看到当年把自己打成右派的人，和自己关在一个院子里，过着和自己一样的生活，看到昔日对自己发号施令，耻于与自己为伍的人，现在和自己处于同样的地位，他高兴了，甚至还颇为欣慰地对妻子说：都一样了，都一样了。

尽管萧乾为之欣慰的，仅仅是被毛泽东支持上层红色子弟揪出来的文化官僚们，但也同样在情理之中，完全属于一个正常人的真实心理反应。可是，李辉硬要将其定论为：“这是一种扭曲的心态。政治风云的磨难，无形之中已经淡化了他心底善良的愿望。这善良，人类宝贵的同情心，悄然间被他潜藏着的报复心理所淹没。”（3）

李辉在同一本书中对其他主人公相关心态的评论，也持同样的见解。

这是对真实人性的观念式扭曲。其实，人的如此心态，勿须“政治风云”打磨，就是日常纠葛也会导致。作者如果没有兴趣了解心理学常识，尽可设身处地内省一下自己的心理世界：如果自己是萧乾，当时的正常反应会不会那么崇高？作家虽有解释他人内心世界的思想权力，然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应该成为其中的准则，否则必将失真——从作者的观念到人物对象的内心。

我愿以几件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来具体说明当年“右派”与造反派的真实关系。

我所在城市近郊有一个地区农科所，集中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名“右派分子”。1966年11月造反派兴起之后，他们中的“摘帽”者纷纷起来造反并成立了跨单位跨行业的造反组织——“一二七沧桑战斗团”，未摘帽者虽然无权参加组织，但大多倾向于他们的观点，并暗地出谋划策。造反之初，他们思想和行为的激进在这座城市非常著名，以至1967年“二月镇反”时被定为本地第二号“反革命组织”，遭到最残酷的镇压。尽管后来为了政治合法性，他们

吸收了不少原保守派中的工农分子加入组织，并主动退居次要位置，但他们激进的造反倾向，一直保持到1969年单位革委会成立。

大学同学邹某，其父系某省戏剧学院流放到本城农科所劳动改造的“右派”。1983年，邹某向我讲起“文革”中造反派对其家庭的歧视和迫害。我就自己所知的事实告诉他：其母参加了单位造反派，其父实为农科所造反组织的幕后参谋，他们从未遭受过造反派的歧视或迫害。相反，有两位喜欢文学的造反青年一度成为他家的常客，一直以“老师”和“师母”尊称其父母。要说受迫害，那是因为这两个造反青年1971年在“一批双清”运动中被审查而使其父母受到牵连。但整其父母的不是造反派而是掌权军人。邹某少年时的记忆苏醒，连称属实。

街道造反青年Y，1969年偶获1957年出版的《星星》诗刊一本，读后深为被打成“大右派”的流沙河抱不平。随之竟以一套《鲁迅全集》从朋友手中换得停刊前的《星星》诗刊全套——不惜以“合法”换“非法”，而且一直珍藏。1981年，已是诗人的他借调到《星星》编辑部工作，有幸与流沙河面识，渐成知交。谈起这段换书往事，以及为躲避全城大搜查而多次转移藏书地点的经历，流沙河深为感动，并为有人敢于在“文革”中珍藏下《星星》全套而大为称奇。他随后将这套《星星》送给了流沙河。

工厂造反青年Z，1973年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在地区医院内科主任职位被打成“大右派”的医生张敦仁，二人遂成忘年交。政治和经济，历史和现实，国家和个人，无所不谈，情谊之深，几达数日不见即感寂寞之状。敦老之兄张默生，系原西南文联副主席及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1957年因替流沙河《草木篇》鸣冤，被毛泽东点名批判打成“大右派”。默老1974年来乃弟家中作客，敦老即将忘年交引介给兄长。Z假托《悼鲁迅》之名作抒怀言志七言排律一首请教，诗中隐含了不满黑暗现实、坚持思想探索、追求人生价值的意旨。默老读后连声称赞，并手书一份带回。诗如下：

风满三更横缁衣，  
月照九州展素尺。  
寂寞暗地埋旧事，  
彷徨深处发新枝。  
霜凝纸上云雨醒，  
雷鸣笔下春秋驰。  
一枕何付潇湘梦，  
千古不朽国魂诗。

同年，Z的胞弟与另一朋友前往省城拜望默老。临别，默老笔书对句转赠于Z：“到人之所未到，言人之所未言。”殷切之望跃然纸上。“文革”结束后，默、敦二老相继平反。Z不愿以现在身份牵连于人，遂于1977年与他们中断交往。默老后来逝世。敦老仍健在并任地区政协常委，多次捎口信让Z去看他，但Z心有苦衷一直回避。

1971年“一批双清”运动中，我在监狱里认识了两位“右派”难友。他俩一名钟子鲂，一名肖庆伟，在此前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捕，罪名皆为“用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腐蚀青年”。他们早我半年入狱，现与我同室而囚。二人得知我的名字，皆言一直很关注我的动向，曾托人介绍相识，但始终未成，不想今日相会狱中。我同样久闻其名，有心请教，想不到心愿竟在此时此地达成。钟原系某军区《战友》报主编，大尉军衔，1950年代受到毛泽东称赞的“逢山开路，遇水造桥”口号就是由他提出。肖原系省城某高校哲学系讲师。他们皆因1957年打成“右派”而流放本市农科所劳动改造。二人对社会与人生颇有见解，特别是肖与下层黑色子女多有交往并颇多指点与启迪。正处青春迷茫期的我，久旱逢雨一般从他们身上汲取真知的

点点滴滴。追溯足迹，我思想的旅程就是从那里迈出最初的一步。

说到下层民众造反之事，二人从不隐瞒支持心态，但更充满担忧。一日相互和诗，肖和我七律一首：

方刚血气南冠诗，  
遗恨白帝滩上石。  
英雄亦作黄梁梦，  
美女不少薄命事。  
战罢夷狄藏书剑，  
了却君王敛行志。  
大马金刀名将在，  
况尔龙泉只三尺。

1、2句，先赞我反对官方“批清”运动的大字报，后惜我入狱之事。3、4句，感叹共同的造反空想。5、6句，自喻“大鸣大放”后即与毛体制决裂而甘为隐士。7、8句，再叹官僚势力太强大，造反派难以成事。

半年后，二人分别被判刑离我而去，终未再见。

据传，1970年代末二人的“反革命”罪名和“右派”身份皆获平反。钟大喜过望，狂饮之时突然辞世；肖欣喜若狂，投河自沉而亡。倘若传闻属实，就将这段文字作为我对他们的小小怀念。我希望传闻是假，他们平反后依然健康、愉快、热情地生活着。在这座城市黑雾弥漫的年代，他们是最早在下层青年心中点播民主与自由小小火种的人。

无论从心理或社会理论角度透视，还是从历史和现实利害关联分析，造反派与“右派”的关系都应该明明白白，勿须多疑。

然而，就是有人要用官方话语来取代历史和歪曲事实，好像不这样做，自己以《反右派始末》为书名的记实作品就会失去份量。我指的自然是记实文学作家叶永烈。

在这本书中，作者用了整整七页的篇幅专门论述自己关于“文革成了第二次反右运动”的立论。他的依据是什么呢？不是事实，而是官方话语，也就是毛泽东1966年7月8日致江青的信和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十六条》。因为这两个文本中，既有“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用语，又有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同于“党内右派”的提法，作者就断定“文革”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继续，性质完全与“反右”运动一样，“文革”是第二次“反右”运动，55万“右派”分子的遭遇比1957年更加悲惨。4

这完全是政治话语对事实真相的搅和，作者面对历史现象时应有的正常判断，完全给搅混了。比如作者明明看到了“文革”与“反右”的不同之处：“反右”主要整党外民主人士，“文革”主要整党内当权派，仍坚持认为，前者属“党外右派”，后者属“党内右派”，二者都是“右派”，所以“文革”与“反右”都是“反右运动”。

当下中国，这类似是而非甚至胡搅蛮缠式的言说，实在太多。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自己搅昏了不说，还要把受众也搞糊涂。历史真相岂能敞亮？

作者的糊涂可能来自，没有看到“文革”的运动模式分为截然相反两种类型并分别推行于三大历史段落：1966年5月—1966年10月，先是刘少奇按照传统思维和传统方法主持整个运动，后是掌握着运动领导权的各级当权者及其所支持的官办红卫兵继续推行“阶级斗争”模式，运动的确与“反右”一个套路：依靠对象是红色子弟，打击对象是包括“右派”在内的文化界知识分子和各界黑色人群及其子女。1966年秋季—1968年夏季，从毛泽东及其极端派发起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开始，运动发生了由“阶级斗争”模式到“路线斗争”模式的方向性转变，依靠对象是前一时与“右派”同时挨整的杂色人群，打击对象则是各级当权派。1968年夏季—1976年秋季，这一方向性转变实际上发生了逆转——运动模式重新由“路线斗争”变为“阶级斗争”，依靠对象又恢复成红色人群，打击对象又恢复为包括“右派”在内的黑色人群和包括造反派在内的杂色人员。

例如：在1966年6月11日的文化革命汇报会上，刘少奇明确提出：“这是新的反右斗争”，“学生、教师中的右派分子有多少就定多少”。刘在6月13日批转中南局和西北局的两个报告中同样批示：“对大学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对高中应届毕业生中的一些人，经市委批准，可以批斗和戴帽。”<sup>5</sup> 相信1957年当过“右派”的人，定会觉得这种声调特别耳熟。是的，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刘少奇就是这样来看待和领导“文革”的。他的确认为“文革”就是“反右”的延续，他确实是要再一次从教师和学生中大抓“右派”。“文革”如果按刘少奇沿用的中共传统模式继续搞下去，或者按照各级当权派和保守红卫兵的作法——继续将上层知识分子和下层黑色人群当作主要斗争对象，确实会变成一场货真价实的“反右运动”！

但毛泽东的看法和作法完全与此相反：毛此时所说的“右派”，人人都知道是指刘少奇为首的当权派和顽固守旧的保守派。

如果叶永烈只以刘少奇主持的1966年5—7月，或者各级当权派掌控运动和保守红卫兵独霸天下的1966年8—9月来证明自己的立论，尚能成立；可是他偏偏要隐去这个阶段，而将知识人群遭迫害的党委领导时期和官僚人群受冲击的造反派得势时期统称为“反右”运动的继续，就难以自圆其说了。怎么能将这之后挨整但在这之前一直整人的当权派，与“右派”拉扯在一起呢？怎能将两者挨整的性质混为一谈呢？台上历来的整人者即使此时挨了整，与台下历来挨整者的根本利益也不可能一致，怎么能将二者等量齐观？要知道权力与知识、官僚与文人历来就势不两立，更何况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

在书中，作者还玩了两个概念弯弯绕式的误指游戏：首先不提民众心目中的“文革”要义是1966年10月—1968年8月的整党内当权派，从而让人觉得，从“右派”附带挨整的运动初期开始，整个“文革”的要义都是整“右派”——从党外整到党内，1957年的“右派”与现在的当权派命运相连，休戚相关，原是同根生。其次，不提1966年5—10月整“右派”的责任人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各级当权派和官办红卫兵，也不指明1966年10月—1968年8月整当权派的责任人是毛泽东、中央文革和下层造反民众，更不说明1968年8月—1976年10月整“右派”的责任人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邓小平和各级革委会的掌权军人与掌权干部，而巧妙地用了两个抽象概念“文革”和“红卫兵”来泛指，让人觉得整“右派”和整当权派的是同一伙人。是什么人呢？只能是被宣判了政治死刑的造反派。

两层误指游戏完成，作者的真实用意跃然纸上：“右派”与当权派，都在同一运动中为同一伙人所害，所以二者属于同一战壕的战友。

是的，通过论证二者在“文革”中的生死联系，来加强他们在现实中的亲和性，正是作者



的良苦用心。

由此看来，以为作者犯糊涂，纯属误会。作者所求的其实是郑板桥式的假糊涂！

国内学者林贤治同样说过“文革”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放大。但他的立论依据，却是“文革”和“反右”中官方行为本质上的相同之处：前期鼓励造反，后期收拾造反者（6）。在他看来，“文革”中与“右派”命运相同的人，不是“当权者”而是“造反者”。其立场与叶永烈完全相反，结论也比较接近真实。

已故海外学者杨小凯因为“文革”时湖南省原《湖南日报》总编刘凤祥为首的一些“右派”曾参与民众造反，就断言全国“大部分右派文革时都是造反派”<sup>7</sup>，显然有些武断。事实上，湖南的这种现象只是全国的特例而非通例。“文革”中的受歧视受迫害人群造反有一个严格的限定：必须限于所谓“人民”范畴之内。当时起来造反的杂色人群，无论显在和隐在黑色家庭出身的青年，还是自身有“历史问题”的成年人，或者其他受压抑的人员，他们最低限度也必须属于“人民”阵营——即使处在这个阵营的边沿。“右派”造反，最大可能也只有那些摘去帽子名义上已经属于“人民”的人员才敢。

1966年底，全国出现了第一次包括“右派”在内“十七年”受迫害人群要求平反翻案的高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急忙于1967年1月13日制定了那个著名的《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严格规定了包括“右派”在内的“黑五类分子”不许参加造反的四个“不准”。1967年“二月镇反”被否定后，全国又出现第二次包括“右派”在内“十七年”受迫害人群要求平反翻案的高潮。青海省革委会办事组特地向中共中央反映，声称“要求平反的都是1952至1965年的问题”，他们无法解决。1967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在转发这份反映时又专门下发了《关于不准地、富、反、坏、右乘机翻案问题的决定》，除了有一句“个别错案，确实需要甄别的，也要放在运动后期处理”之外，实际给包括“右派”在内被视为“阶级敌人”的黑色人群关上了最后一道铁栅栏。

1966年10月—1968年8月，时常可见一种名为“走访记要”的大字报和传单张贴于街头，内容大多是受迫害人员就所关心的政策问题走访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或省革委、省革筹相关部门的谈话记录。我手里有一份当年这类“走访记要”的抄件，是我所在城市农科所已摘去“右派”帽子的Y于1967年9月22日走访四川省革筹政法组余同志的谈话记录，也是问答式。走访动因自然是摘帽“右派”参加群众组织后，不仅“二月镇反”遭到残酷镇压，而且至今仍然受到非议之事。现将要点摘录如下：

问：摘掉“右派”帽子的革命群众是否以表现好坏来确定能否参加文化大革命？什么人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

答：“右派”是敌我矛盾。摘掉帽子就不是“右派”，是革命群众，就有四大权利。《公安六条》规定的人之外都能参加文化大革命。

问：我们已经摘掉“右派”帽子，这次起来造刘邓路线的反，揭发“反右”工作中那些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对不对？

答：应该这样做。

问：我们自己成立了革命群众组织。是否属于“右派组织”、“反动组织”、“反革命组织”？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成立组织？

答：怎么能这样说呢？已经摘掉帽子就有四大权利。成不成立组织你们自己决定。我没有看见过不准成立组织的文件。

这份走访记录，还包括另外三项相关内容：“二月镇反”中保守组织对摘掉“右派”帽子的

造反者进行迫害属于什么性质？这些受害者是否有权参加处理“黑材料”？他们是否有权批斗迫害自己的“走资派”？所有这些，都是围绕“右派”摘帽者参加造反的政治合法性问题。摘帽者尚且如此忐忑不安，更何况戴帽者！

当时“右派”与造反派的真实关系，不是大部分亲身参加造反，而是大部分内心同情造反。

1966年的造反派与1957年的“右派”，由于不同的历史表现和历史遭遇，而有着不同的现实评价和现实命运。“文革”四十周年和“反右”五十周年的今天，澄清1966年10月—1968年8月期间造反派与“右派”的真实关系，不仅有助于我们公正评价造反派的形象，而且有利于我们找出极权制度下各种变态民主举动的隐蔽联系。

2007年4月15日于古邛都森林居

1. 刘小雁编：《关于不会说假话的中国人的故事》，西安·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49—313页。
2. 邵燕祥著：《人生败笔》，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第7、127、128页。
3. 李辉：《风雨中的雕像》，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2月，第577—583页。
4. 叶永烈：《反右派始末》，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第577—583页。
5. 参见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8—149页。
6. 林贤治：《自制的海图》，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年6月，第85页。
7. 杨小凯：《六四省悟：为文革造反派翻案》，纽约·《中国之春》，1990年8月号。

~~~~~

## 【往事如烟】

吴宓“偷书”

• 何 蜀 •

著名学者吴宓，曾经冒险“偷书”。

这是发生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史无前例”之事，是吴宓自己在日记中如实记下来的（见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续编》，三联书店2006年4月第一版）。其缘起，在于文革初期红卫兵的抄家。

1966年“八一八”之后，京城红卫兵开始“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经各大喉舌媒体《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连日里欢呼“好得很”，大张旗鼓、“狂轰滥炸”般的宣传炒作，此风迅速蔓延全国，各地争相仿效。重庆的抄家，是从8月下旬开始，由党政领导支持的官办“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赤卫军进行的。抄家对象名单，一般是由各地区各单位党政领导和公安派出所拟定的。

吴宓当时在位于重庆市郊北碚区的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任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因年高（1966年已73岁）且思想跟不上“革命形势”，已经长时间没有安排他上课。但他在这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风暴中也不能幸免。8月31日，西师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开始抄家，中文系先抄了潘仁斋、郑思虞等教师的家。据吴宓在他那几个月日记被红卫兵搜走后所写的备忘录中记载：

“九月二日上午红卫兵（中文系）来宓舍搜查：共来四次，取去《学衡》《大公报·文学副刊》全套，《吴宓诗集》26部，吴宓日记1910至1966八月二十三日，吴宓诗文稿笔记，以及其他书物（生活资料、旅游画片、毕业证书、有关恋爱书刊、西洋名画等）。”（《吴宓日记续编》第七册532页）

后来在1967年除夕之夜，吴宓在日记中补记了他给造反派组织“交待”的那次被抄家后的感想：“经过此次‘交出’之后，宓的感觉是：我的生命，我的感情，我的灵魂，都已消灭了；现在只留着一具破机器一样的身体在世上，忍受着寒冷与劳苦，接受着谴责与惩罚，过一日是一日，白吃人民的饭食，真是有愧而无益也！”（同上书第八册38页）

吴宓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反感的。还在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前，他就在7月26日的日记中记下了对这场“大革命”尖锐的评价：

“忆1923济在《学衡》中著论，谓今之中学生感情盛，意志强，而理智弱，知识、经验并乏，言论家（政客）惟事鼓荡，至若辈者弱者自杀、颓废，强者愤世嫉俗，今日本身受损，异时祸及国家社会，云云。又西人恒言：‘天下最危险之事，莫如以利刃置诸小儿之手，使之乱割，伤己伤人。’呜呼，四十年世变，至今文化大革命运动，以上之言验矣。”（同上书第七册496—497页）

8月1日，中共重庆市委驻西南师范学院工作组在全校大会上宣布：“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两个月来，西南师范学院已经揭发出以副院长王逐萍、方敬为首的“黑帮”，号召全校革命师生继续深入揭批。吴宓在当天日记中写道：

“今知运动转入批判斗争阶段，宓不胜忧惧。众对王逐萍及方敬皆‘墙倒众人推’，纷纷从井下石。其实西师领导人中，能知晓教育、学校及学术、课程、业务为何事者，仅一方敬而已。宓以方敬为西师惟一功臣，亦宓之知己，今见其覆亡，不敢效蔡邕之哭董卓矣。”（同上书第七册502页）

方敬是现代诗人、散文作家、教育家，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三八”式干部，在西师分管教学业务，对吴宓十分尊重。吴宓说“今见其覆亡，不敢效蔡邕之哭董卓矣”，当然不是把方敬比作董卓，而只是借用这一历史典故来说明自己在“红色恐怖”下面临的可悲处境：不敢对有知遇之恩的人遭难表示哀痛。8月2日，吴宓在工会组织生活会上的发言被斥责为“美化方敬”、“为方敬辩护”，他又在当天的日记中再次使用了这一典故：“哀哉！蔡邕哭董卓之死，为王允所杀，宓之谓乎？”（同上书第七册504页）

蔡邕是东汉末年文学家、书法家，在董卓专权时，被迫为官，官至左中郎将（故称蔡中郎）。董卓虽专横，但却很看重蔡邕的才学，对他“甚见敬重”，“厚相遇待”，董卓被诛后，蔡邕在主持诛杀董卓的司徒王允面前“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被王允斥责他“怀其私遇，以忘大节”，并认为“今天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竟将其下狱，后死于狱中（见《后汉书·蔡邕传》）。

8月7日，吴宓读了报上批判周扬、罗列周扬各种“罪行”的文章后，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独特的感慨：“阅报，益觉周扬尚有关心文艺、为民请命之意；此后，除歌颂毛泽东思想而外，无丝毫学术文化之存余矣。”（《吴宓日记续编》第七册512页）

8月23日，吴宓在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遭众批判斥责”，他当晚在日记中写道：“……

自毛主席会见北京文化革命代表后，全国骚然，宓既心痛数千年中国文化之亡，又忧宓本人在运动中能否过关之事，于是近两日宓心神恍惚，已不能神志清明地控制指导自己之言动……”

他悲叹：“且自学生主政，运动之期限延长，须至1967年春夏方可望结束，是则宓决难望活至运动结束之时矣。”

在这天日记中，他还记载了下午的全校大会上学生代表要求将学院办公楼、图书馆等另改革命名字，院文革筹备委员会主任、院长徐方庭讲北京商店街道的改名情况等，他悲伤地写道：“知此次由毛主席之提倡，红卫兵之活动，北京以及各地之更改孔多，不但千年中国文化，而全国社会秩序亦骚乱不堪矣。”（同上书第七册529—530页）

此后，西南师范学院的形势发生了一次又一次令人眼花缭乱的剧变。先是造反派组织八三一战斗纵队夺了权，打垮了官办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接着八三一纵队又在1967年3月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组织”，被迫解散，西师改由新成立的春雷造反兵团掌权。4月初开始“反击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八三一纵队恢复活动并得到平反，与春雷展开势不两立的斗争……但不管当权者如何演变，吴宓他们这些“牛鬼蛇神”始终处于被惩罚、被批斗、被监督管制的地位。只是直接监督管制他们的人员不断更换而已。

1967年2月8日，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个除夕。国务院已于1月29日宣布：“当前正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为了坚决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新的高潮，国务院决定：一九六七年春节不放假……”因此吴宓当天仍在教师“劳改队”参加了劳动（做三教学楼和中文系办公室的清洁）。当晚，吴宓在日记中悲愤地写下：“宓在世已七十四岁，计生平过年未有如今年之悲凄者。倘于1966春死去（病歿）宁非宓之大幸；今惟祈速死而已。”（同上书第八册38页）

1967年5月9日，吴宓在“劳改队”劳动中，再次看到了自己被抄去的心爱的书物，他在当天日记中痛心地写道：“1966八九月之交，红卫兵抄去郑思虞、徐永年及宓等之书稿文物，均锁置于3121室中。今因需用该室，遂于10—11时，呼劳改队诸君往，将室中所存悉搬来教师阅览室，堆置书橱间及地上，宓之日记及《吴宓诗集》、《学衡》杂志等全在焉。旋命诸君往扫除该室竟。最后二红卫兵（学生）来，贴封条（‘1967五月九日八三一中文系大队封’）书橱巷门及宓之书物上。——宓目睹心爱之书物不得取回，不胜伤心愤恨……”（同上书第八册124页）

74岁的老人吴宓，就是在这样“不胜伤心愤恨”的心境中冒险“偷书”的。

1967年6月，西师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冲突，春雷造反兵团获胜后撤走。7月，八三一纵队被赶走，春雷造反兵团打回学校重新掌权。因为两派已陷入真枪实弹的“全面内战”，重新统治了学校的春雷造反兵团无暇再紧盯着吴宓这类“牛鬼蛇神”了，而让他们几个老师组成一个学习小组，每天进行学习（读报纸和毛泽东的《语录》、著作等）。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9月27日，机会来了。

吴宓在当天日记中记载：“下午阴、风、寒。3—5：30学习；仍在中文系资料室。……教师阅览室门偶开。入内察视，红卫兵所抄去宓之书物，均在，然多破损。宓乘间私取回1914甲寅上半年之日记一小册。”（同上书第八册264页）

初次得手，显然增强了吴宓的信心和勇气。十天后，10月7日，他再次“偷书”：“上午7：30—11：30中文系上班……取回宓1951日记及毕业文凭（英文）三张。”“下午3—5中文系上班……宓取回《游美同学录》一册。”（同上书第八册270页）

吴宓一发而不可收。两天后的10月9日，他再一次“偷书”，没想到，这次却出了意外，差点被人发现，但幸好是有惊无险。他在当晚日记中记载：“上午宓又自中文系阅览室取回《吴宓诗集》一部，以赠与凌道新。宓仍插悬于衣内之胸前，但当众写大字报时，宓俯身左偏，《诗集》忽堕于地上。——幸坐宓后之刘又辛君，似未之见，此外无人注意。”

所谓“写大字报”，是指他们被强迫为春雷造反兵团抄写大字报。凌道新，是历史系教师，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不在他们这个学习小组，而在“劳改队”（后于1974年初被迫害致死）。吴宓在这天的日记中还写道：“又私取抄去之书物归，今日上午是其最后（终）机会，盖今日下午即有中文系革命教职员来本室视察整理，随即用锁扃本室门，宓不得再入此室随意取回书物矣！”（同上书第八册271页）

但是，吴宓仍不甘心。此后他又继续了他的“偷书”行动。11月2日，他又发现了机会：“11—12教师阅览室门开，宓乃入内，整理所抄去宓之书物，乱堆地上者，粗毕。乘间私取回（一）《雨僧杂稿》零页之大部分（已全）；（二）《乙卯日记》第一册以归。”（同上书第八册291页）

12月7日：“3时，至中文系上班；众皆未到，系内无人。成君遂为私启教师阅览室门，俾宓潜入，私取得（1）《虚无夫人》卓浩然剪贴本（2）《色戒篇》（3）《印光法师嘉言录》（4）《吴宓诗集》一部。即携归舍。”（同上书第八册310页）

“成君”即成文辉，原为西师工农速成中学教员，“摘帽右派分子”，贬为中文系资料室资料员，是他们这个教师“牛鬼蛇神”学习小组中最年轻的一个，被春雷人员指定为组长。成文辉的家庭经济困难，常得到吴宓的济助，因此对吴宓比较照顾。这天日记中，吴宓还写了当晚凌道新来看他时，他“命新以《印光法师嘉言录》带交樊阅。”“樊”指曹慕樊，中文系教师，“右派分子”，与凌道新同在“劳改队”昼夜看守学校的茅厕（不让外人来偷粪）。

12月25日，吴宓“得寸进尺”，向成文辉提出要求：“夕，成文辉来……宓托成君：……（二）得便，放宓再入教师阅览室检书物一次。——成君颌之而去。”（同上书第八册333页）

两天后，12月27日上午：“成君为开教师阅览室门，俾宓入内，取得（一）《武汉日报·文学副刊》全一份（二）Just Oxford画册等，暂存。（三）《古今通俗小说》三册，付谭君读。”（同上书第八册335页）

“谭君”指谭优学，中文系教师，与吴宓同在一个“牛鬼蛇神”学习小组。

从吴宓的日记中可知，吴宓不但冒险“偷”回自己这些被抄走的书物，而且还公然把其中一些拿给其他同事去阅读，甚至“赠与”或托“带交”尚在“劳改队”的“右派分子”凌道新、曹慕樊阅读。这在当时若被发现，肯定是要遭到严厉批判的“传播封资修黑货”、“放毒”的“反革命”行为。然而，吴宓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些。

这可以看作是文弱而年迈的吴宓对那场毁灭文化的“文化大革命”作出的特殊的反抗。

~~~~~  
【动态报道】

文革研究需要“搜索引擎”

• 何琥皓 •

“像文革这样的大运动，大事件，没有理由不成为一门显学。”内蒙“文革”风云人物高树华，在2003年他刚刚迈入老年的门槛就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之前，这样坚信。他的最大遗愿是：作为当事人，自己的如实陈述，能成为新时代这门显学的“搜索引擎”。

“文革”去今四十年，“文革”中的“闯将”“斗士”在经历大半生的折腾颠簸之后，纷纷退出历史舞台，许多人已经告别人世。很少有例外，他们都有一肚子话要说，但是为现实环境所不允许说。高树华是幸运的，他在去世之前，将自己惨痛回忆与感悟，灌注于一部书稿，又委托了自己当年的学生程铁军作为合作者，来完成这部著作。现在，高树华、程铁军两位作者合著的《内蒙文革风雷：一位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在明镜出版社出版，并参加了眼下正在举行的香港书展。

1966年6月3日，25岁的内蒙师范学院教师高树华与他的三个同事，写下了“内蒙第一张大字报”，从此就从一个根正苗红的“接班人”被甩进了“文革”政治斗争的绞肉机。他的“文革”经历比别人更多了几分传奇色彩，因为他曾经是前内蒙王乌兰夫之子力沙克的朋友，帮助他逃出牛棚，便与内蒙乃至华北地区中共高层内斗无端地扯上关系。他的“文革”以被工作组关押近两个月始，又在1977年12月失去自由、被隔离审查，1979年12月以“帮派骨干分子”名义被逮捕，关押五年半告终，1983年7月才以“不予起诉”获释。

在两次铁窗生涯之间，风云际会，高树华走过十分曲折的人生轨迹：他被推选为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到北京与聂元梓和蒯大富串联，1967年2月参加中央关于内蒙问题的“四方会谈”，随后又参与内蒙革委会筹备，被任命为办事组组长；在内蒙革委会成立时，担任政治部副主任兼文艺办主任，参加中共九大、全国四届人大，历任内蒙教育局普教组组长、土左旗旗委副书记、革委副主任，1976年他升任内蒙首府呼和浩特市市委书记、革委副主任。高树华十多次谒见周恩来，同毛泽东、朱德、林彪握手；他在九大上发言肯定胡耀邦的共青团工作，支持胡当中央委员，因此得罪江青，受到江当面斥责；他更经历过挖“内人党”冤案的惨烈。

出狱后，他教书、经商、撰稿、当编辑，为经商涉足蒙古、俄国、欧洲等地，不管走到哪里，始终不能忘怀“文革”的经历和教训。他自己在“我的遗愿”中说：“构思这部回忆内蒙文革的口述史，萌发于1983年夏我走出监狱的那一天。但真正坐下来动笔，是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得知自己患病，他的紧迫感大增，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抱病赶写这部血泪记录。

由于他的特殊经历，这部口述史，罗列出一连串事件和人物，从学生、士兵、工人、农民、到将军、知识份子、党和国家领导人，构架出一幅文革历程的真实图画。

内蒙因为是蒙古族聚居地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又处在中苏对峙的最前沿，“文革”中的政治冲突和社会冲突分外复杂、激烈，短短几年间先后换过几任领导人，而像滕海清等不少军人，根本不懂蒙族历史、文化和心理，不懂民族政策，每一任上任都意味着血雨腥风，无数干部和民众家破人亡。其中最惨烈的就是所谓“挖内人党”事件，整人数以十万计，仅一个西苏旗（相当于县）就造成上百人致死、上千人致残。书中指出：滕海清自己在《关于“内人党”问题的汇报提纲》（即12月汇报提纲）所写，“根据四盟、二市的不完全统计，到（1968年）1

2月10日已挖出内人党徒10900名”。这是多么惊人的数字！而滕海清听江西领导人程世清说江西挖出40万暗藏的坏人，倍感压力，认为内蒙还得继续深挖，掀起新一轮迫害高潮。

高树华说：本书的宗旨，是要用亲身经历和真实资料，向无知者和盲从者述说文革的真实场景，让后人从这些场景去探究：文革何以发生和如何发生？为什么全党全民会“集体疯狂”？

既有切身体验，又做过深入思考的高树华，对“文革”有许多独到的领悟，他认为：文革是一个“变态怪物”：一方面，它貌似一场改造党的试验，是最高领袖带动亿万群众，清除异化的伟大创举；另一方面，它又是传统官场与民众角斗的现代翻版，是共产党人几代恩怨和派斗的历史延续，是毛领袖利用专制铸就神权，对不同政见者发动的总围剿；第三方面，它同时也是遭受禁锢的工农大众、知识份子，对专制暴政的间接反抗，是共产党对失去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地盘的无奈争夺。“它涵盖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历史内容和学术价值，绝非官方文革版本，只用‘否定’二字，便可一笔抹杀；更非‘错与对’、‘是与非’的简单逻辑所能概括。”

高树华更尖锐地指出：“如果说，毛领袖的专政偏好和继续革命理论，是文革暴力的直接动力，那么，普遍滋长的暴民意识，便成为文革的肥沃土壤。”

旅美文革史专家刘国凯赞扬这部著作说：“这本横空出世的书，必将对中国史学界、社会学界乃至文学界产生深远的巨大影响。它不单是文革史书，还是人性之剖析、人格之升华、人道之觉悟的巨卷。”确实，不同于许多“文革”风云人物仅仅是“政治动物”“斗争机器”，高树华这本书的字里行间闪现著超越于政见、路线之争的人性光辉。在高树华笔下，人际关系绝不仅是不同营垒的生死搏斗，还有家庭亲情、夫妻爱情、同事友情。他笔下的“文革”画卷，呈现出更丰富真实、更有血有肉的面貌。

本书的合作者程铁军，视高树华亦师亦友。他在读内蒙师院英语本科时是高树华的学生，后来是同一造反组织的成员，“文革”中在《内蒙古日报》担任记者、编辑，后来改任教师。“文革”后他获中国社科院世经所经济学硕士，赴美留学，先后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硕士、博士，担任该校研究员、助理教授。还从事过两年的NGO组织RFA编译研究。2000年他到澳门大学任教，现为该校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户口制度研究》等专著，另有《内蒙古奇谈》等中英文论文数十篇，发表于海内外杂志报刊

程铁军说：2003年6月下旬，突闻高老师病逝的噩耗，不久，收到高老师临终前托朋友辗转寄来的一大包手稿、日记，及许多随手书写的碎纸片，其中包括对我的最后托付。大部分字迹潦草，甚至杂乱无章。面对这些遗物，我心情极端沉重，时常泪流满面，夜不能寐。经三年多努力，总算完成了对草稿的修补改写和整理。

本书扉页献辞说：谨以此书敬献给作者在“文革”中被杀害的同伴韩桐、欧阳儒忱，“以及千千万万在文化革命中遭受过痛苦和冤屈牺牲了青春和生命的不幸同胞”。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能够品出这一献辞的沉重。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